

隨義而發：

從范仲淹詮釋《易》的方法看宋學典範的形塑

莊祐端*

提 要

宋代經學的特色是「以己意解經」，不拘泥於傳、注、疏的解釋，直接對經典進行詮釋，大異於漢代的章句訓詁方式，宋代的易學亦同樣呈現此特色。程頤常被視為宋代義理學的代表人物，但程頤易學受胡瑗影響甚深，而追溯胡瑗的師承和學術養成背景，可知胡瑗治學方式深受范仲淹影響，范仲淹堪稱是開創宋代學術典範的先驅人物。本文將重探范仲淹及胡瑗詮釋《易》的方法，藉由文本重建范仲淹的經典詮釋進路，指出其中展現的宋學典範，進一步釐清范仲淹及胡瑗在宋代學術轉變與形塑過程中的地位。

關鍵詞：范仲淹、胡瑗、易學、宋學、典範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易學是中國古代知識的核心領域，因此詮釋《易》的方式同時代表學術的一種典範。知識之所以可以形成「典範」，意味透過這個「典範」，人們得以對所認知的事物賦予「意義」，且讓事物與事物之間產生有「意義」的連結，從而形成一個對認知主體來說具有「意義」的世界。緣此，「典範」即是一種看待世界，詮釋世界的方法。易學可區分為義理和象數兩條詮釋進路，義理易學到宋代出現新的高峰¹，程頤（1033-1107）常被視為宋代義理易學首位代表人物，其後的朱熹受他啟發甚深。

宋代義理易學可視為宋代學術的典範，宋代學術特色是「以己意解經」，不拘泥於傳、注、疏的解釋，直接對經典進行詮釋，大異於漢代的章句訓詁方式。程頤易學的特色即是直接詮釋卦象義理，不過這種方式並非程頤開創，同樣是來自前人啟發。程頤的詮釋典範受北宋三先生的胡瑗（993-1059）影響甚深²，然而正如程頤繼承胡瑗一般，胡瑗解《易》方式同樣不是孤明先發，因為詮釋典範的轉移，必須建立在社群的基礎上，一群人以相同的方法進行詮釋，彼此呼應才能形塑「典範」。追溯胡瑗的師承和學術養成背景，可知胡瑗治學方式深受范仲淹（989-1052）影響，范仲淹堪稱是開創宋代學術典範的先驅人物，後人甚至以「慶曆易學」來指稱范仲淹開創的解《易》方式。³

本文將重探范仲淹及胡瑗詮釋《易》的方法，指出其中展現的宋學典範，進而釐清范仲淹及胡瑗在宋代學術轉變與形塑過程中的地位。已有前行研究指出范仲淹對《易》的詮釋在易學史上扮演轉折角色，如朱漢民認為范仲淹解《易》展現典型的宋學精神，是玄學過渡到宋學，亦即儒家易學的關鍵人物。⁴本文旨在結合儒家義理和經典詮釋，說明兩者與范仲淹個人生命情調的關連，藉此剖析他的為學精神和改革動機。⁵

¹ 義理和象數兩派關心的面向不盡相同。戰國時代儒家從義理角度來系統性地解釋《易》，逐漸形成《易傳》。漢代易學因為結合陰陽感應學說，象數易學的發展突飛猛進。魏晉時期王弼（226-249）以玄學關注的「有」、「無」等概念解釋《易》，讓義理易學獲得新的生命。

²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台北：藍燈文化事業，1991年），頁197-199。

³ 楊亞利：〈「慶曆易學」發微〉《周易研究》4期（2004年），頁71-80。

⁴ 朱漢民關注范仲淹易學中的儒家義理，范仲淹開創的詮釋方法非其論述焦點，見朱漢民：〈范仲淹易學的宋學精神——從玄學易理到宋學易理的轉型〉，《哲學與文化》44卷3期（2017年3月），頁81-93。蔣偉勝則認為范仲淹創建了宇宙論、本體論、工夫論與境界論等「四位一體」的儒家哲學，是參照佛學框架建構儒學，藉以讓儒學得以和民間流行的佛學抗衡，突顯范仲淹在宋代儒學的地位，見氏著：〈范仲淹哲學的架構及其宋代新儒學的意義〉，《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新探索》（2013年），頁414-425。

⁵ 在經典詮釋的部份，李瀋陽指出范仲淹的易學有闡明儒理、參證史事、對比見義等三大特色，「對比見義」指范仲淹會比較卦與卦、爻與爻之間的異同，進一步闡釋其義理。見氏著：〈范仲淹《易義》對《周易》的詮釋方法〉，《濱州學院學報》25卷2期（2009年），頁23-25。此外論及范仲淹思想的學位論文尚有程成：《論范仲淹對北宋儒學復興的貢獻》（天津：南開大學中國哲學碩士論文，2008年）、唐陳鵬：《范仲淹〈易〉學思想研究》（長沙：湖南大學岳麓書院（中國哲學專業）碩士論文，2020年）等。程成從儒學史大背景定位范仲淹的文化功業，也強調范仲淹的易學思想與他一生志業密不可分。以上這些研究雖都涉及范仲淹解《易》的方法，但這些方法對後人的影響為何，則著墨甚少。



關於宋學典範的起源問題，各家說法殊異，主因在於視角之不同，從經學史、理學史或學術史的脈絡來考察宋學起源，所獲結果便不盡相同。范仲淹雖然身處典範轉移的位置，卻沒有完整的經學專書。有關易學的部分，目前僅見《范文正公全集》中收有〈四德說〉、〈易義〉等兩篇討論《易》的文章，此外，范仲淹的賦作中還有〈易兼三材賦〉、〈乾為金賦〉、〈窮神知化賦〉等幾篇融入《易》的作品。儘管從漢學典範角度來看，范仲淹解《易》的方法恐被視為「斷簡殘篇」上的臆測之語，文本數量相較其後的大儒更顯得稀少，然而已足夠窺見范仲淹的經典詮釋進路，以及他所開創的風氣。

二、范仲淹解《易》的方法與思想

（一）隨義而發：〈四德說〉、〈易義〉的解《易》方法

「人」的存在境況往往被客觀環境的種種條件所限制，諸如壽命有限、賴以為生的資源有限等。正因為「人」受限於特定時空，因此渴望預知命運、預知禍福吉凶的變化，成為基本的心理需求。「自我」如何作出正確的判斷，應該要做或不做那些事，才能讓命運朝「自我」所盼望的方向發展？這些心理疑問刺激人們觀察天地間種種自然的現象變化，發展出卜筮活動，從中獲得抉擇的依據。

中國的易學起於人們盼望預知命運變化的心理需求，是一門應用性極高的學問。因此，古代中國的知識人幾乎對《易》有一定的基本認識，《易》在儒家手上被賦予主體哲學的概念。特別在宋儒的眼中，《易》揭示形上道德價值的根源，更具有神聖的地位。⁶《宋史·范仲淹傳》及《宋元學案》均指出范仲淹「長於《易》」，范仲淹之後的宋初三先生，每個人都有易學的相關著作。⁷

范仲淹沒有注《易》的專書，但是透過〈四德說〉、〈易義〉等為數不多的文獻，我們仍可窺見范仲淹的解《易》方法及其中的儒家思想，如〈四德說〉：

《易》有說卦，所以明其象而示其教也。卦有四德，曰元亨利貞。雖〈文言〉具載其端，後之學者或未暢其義，故愚遠取諸天，近取諸物，復廣其說焉。

⁶ 關於《易經》在宋代的經典化，楊儒賓論之甚詳，可參氏著：《從《五經》到《新五經》》（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年），頁279-322。

⁷ 同期的歐陽脩也有不少解《易》的著作，王鐵指出歐陽脩被視為嚴格意義上的義理派易學家，認為《易》雖然來自於卜筮之法，卻寓有深刻的人生哲理，見王鐵：《宋代易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14。歐陽脩否定孔子作十翼的傳統觀念，是易學史的大事，由此可知他不拘泥傳統說法，而是結合他史學家的眼光來進行經典詮釋，見朱伯崑：《易學哲學史》（臺北：藍燈文化事業，1991年），頁97。歐陽脩結合史事證經的做法，和范仲淹十分類似，見李瀋陽：〈范仲淹《易義》對《周易》的詮釋方法〉，頁23-25。宋代易學或以圖說解《易》，如周敦頤《太極圖說》、邵雍《先天圖》等，或以義理解易，如程頤《伊川易傳》、朱熹《周易本義》等，皆可見《易》在宋代儒者眼中的重要性。



《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五十七期

夫元者何也？道之純者也。於乾為資始；於坤為發生，於人為恭良、為樂善、為好生，於國為行慶、為刑措，於家為父慈、為子孝，於物為嘉穀、為四靈。其跡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善之長也。

夫亨者何也？道之通者也。於天為三辰昭會，於地為萬物繁殖，於人為得時茂勳，於國為聖賢相遇、為朝覲會同、為制禮作樂、為上下交泰，於家為父子、為夫婦、為九族和睦，於物為雲龍、為風虎、為魚水。其跡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嘉之會也。

夫利者何也，道之用者也。於天為膏雨；於地為百川，於人為兼濟，於國為惠民，為日中市，於家為豐財、為富其鄰，於物為駟虞、為得食難。其跡異，其道同，統而言之，義之和也。

夫貞者何也？道之守者也。於天為行健，於地為厚載；於人為正直、為忠毅，於國為典則、為權衡，於家為男女正位、為長子主器，於物為金玉、為獬豸。其跡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道之幹也。

行此四者謂之道，述此四者謂之教。四者之用，天所不能違，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故君子不去也。⁸

〈四德說〉一文專解「乾」卦的「元」、「亨」、「利」、「貞」四個卦辭，范仲淹認為雖然〈文言傳〉已有闡釋，但後代學者並未充分發揚其義理。如〈文言傳〉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⁹僅以相當簡略的語言說明人透過道德實踐可達致「元」、「亨」、「利」、「貞」所代表的人事現象。

范仲淹的〈四德說〉則以「元」、「亨」、「利」、「貞」為闡釋中心，分別論述四個卦辭所代表的「道」，從自然界的現象變化到實際的人文活動，都在舉證的範圍。自然宇宙化育萬物，從無到有，代表先於人而存在的這個宇宙，本身即涵藏著道德價值，如果自然界的種種活動已是「四德」的展現，那作為「道德主體」的人更應該順應自然長養萬物，正如引文所說：「四者之用，天所不能違，而況於人乎？」在人文活動部分，范仲淹藉「四德」說明「人」如何扮演國民和家人的角色，發揮不同倫理角色所應盡的社會功能，如「於國為行慶，為行措」可以「長善」，「於國為聖賢相遇，為朝覲會同，為制禮作樂」可以「嘉惠」等等。循此可見范仲淹解《易》並不拘泥前人注疏，他透過經典闡釋自己的理想，讓經典成為儒家教化的思想依據。范仲淹認知的道德實踐不僅是個體的自我修養，還包括社會關懷、經世濟民的政治實務面向，簡言之，范仲淹的經典詮釋更強調「經世致用」的概念。

全文約四千字的〈易義〉則是范仲淹解《易》的代表作，也是目前可見到的北宋闡

⁸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頁161-162。

⁹ 《易·文言》，見〔魏〕王弼；〔晉〕韓康伯：《周易王韓注》（台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頁4。



釋《易》的專文中最早一篇。¹⁰〈易義〉共闡釋《易》經六十四卦中的二十七卦¹¹。《易》有六十四卦，范仲淹只取其中的二十七卦。他只取「乾」和下卦的二十六卦來闡釋，說明他對經典內容的詮釋乃是選擇性的。范仲淹並未像漢唐注疏般將整部經書的全部字句逐一闡釋，他只擷取有助於回應當下處境之問題的部分來闡釋。

《易》以卦象演繹宇宙自然的生成運行之理，但現象界的人事活動亦屬於宇宙自然的一部分，是故通過卦象、卦爻辭背後蘊含之義，即可掌握宇宙自然運行之規律，預測人事的發展，作為處世的指導原則。緣此，從范仲淹所解《易》義，可探知他對形上宇宙的認識，以及人在經驗世界所應秉持的道德準則。范仲淹的〈易義〉流露強烈的改革企圖，以下以「鼎」、「豐」、「艮」三卦為例說明¹²：

鼎，以木順火，鼎始用焉，聖人開基立器之時也。夫天下無道，聖人革之。天下既革而制作興，制作興而立成器，立成器而鼎末先焉。故取鼎為義，表時之新也。湯武正位。然後改正朔，變服章，更器用，以新天下之務，其此之時歟！故曰「革去故」而「鼎取新」。聖人之新，為天下也。夫何盛焉？末盛乎享上帝而養聖賢也。享上帝而天下順，養聖賢而天下治，不亦盛乎？¹³

「鼎」卦卦象為巽下離上，即風下火上。〈雜卦傳〉解釋簡易，僅說「取新」¹⁴，〈彖傳〉解釋則頗為生動：「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指鼎下有風燃薪生火，可供煮食。王弼解「鼎」卦大抵順著「取新」、「鼎革」之意：「革去故而鼎取新，取新而當其人，易故而法制齊明」。¹⁵范仲淹在前人基礎上發揮，從「鼎」的意象擴充「取新」之義，說明「取新」即「革新」。不過，范仲淹以「聖人」為理想人格，強調天下無道之時，聖人將起而革之，然後「改正朔、變服章、更器用」，充分顯現范仲淹對於「新」的肯定，道德主體應該仿效聖人勇於「變革」，為天下帶來大利。

藉由范氏的「鼎」卦釋義，不難想見他何以重視改革，何以要推行慶曆新政。慶曆新政作為北宋第一個政治改革，面對的是唐代以降未嘗大變的固有政治制度和結構，因此范仲淹的新政在去舊佈新上的意義不可謂不大。而賦予慶曆新政正當性的哲學基礎，正緣自於范仲淹對於《易》的理解。續看「豐」卦釋義：

豐，文明以動，無往不亨，王道開大之時也。夫雷電之至，隱者彰而否者亨；聖賢之造，困者通而幽者顯。於是制乎禮，以序天下之倫；作乎樂，以興天下之和。物物昌而無不大也，是以謂之豐。然則日之動也，豐於正中焉；文明之動也，豐

¹⁰ 方健：《范仲淹評傳》（南京：南京大學，2001年），頁304-305。

¹¹ 此二十七卦為上卦的乾，以及下卦的咸、恒、遁、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損、益、萃、夬、升、困、井、革、鼎、震、艮、漸、豐、旅、巽、兌，見〔宋〕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頁119-128。

¹² 六十四卦的先後順序為「鼎」、「艮」、「豐」，本文為論述需要則依序說明「鼎」、「豐」、「艮」。

¹³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頁125-126。

¹⁴ 〔魏〕王弼；〔晉〕韓康伯，《周易王韓注》，頁245。

¹⁵ 〔魏〕王弼；〔晉〕韓康伯，《周易王韓注》，頁156。



於皇極焉。過乎正中，日昃旻矣；過乎皇極，文明虧矣。故曰「宜日中」，近於大而戒於盈也，丕哉！¹⁶

「豐」卦卦象為離下震上。〈彖傳〉：「豐，大也」。〈象傳〉：「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¹⁷范仲淹解釋「豐」卦，融合〈彖傳〉和〈象傳〉的解釋，強調「豐」象徵的豐隆碩大之意，火與電象徵自然景象的活躍和生機。對應的人事關係即是「制禮作樂」，有志之士與賢能之人努力拓展文化事業，可讓「隱者彰而否者亨」、「困者通而幽者顯」，創造文化的豐隆景象。由此顯現范仲淹對文化建設的樂觀期待，相信造就理想之禮樂社會存在可能性，或許這正是他積極興學辦校的主因。然而，從引文可知范仲淹對「盛極而衰」、「物極必反」的自然現象有敏銳的感受，因此在「豐」卦釋義的最後特別提到萬物「近於大而戒於盈」，提醒文明到達極盛處，下一步可能將是衰亡。

然而，回到經傳原文，卦爻辭僅釋：「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¹⁸，〈彖傳〉則說：「豐，大也。明以動，故丰。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人於人乎？況於鬼神乎？」¹⁹主要指萬物的盛衰生滅乃是宇宙運行的必然規律，實可不必憂慮「日中」。王弼的解釋：「豐之為用，困於昃食者也。施於未足則尚豐，施於已盈則方溢，不可以為常，故具陳『消息』之道者也」²⁰亦將事物的盛衰歸於自然現象，並無意連結道德修養和禮樂教化。但是范仲淹在「豐」卦本義後表達他對「物極必反」的現象心存憂慮，雖然渴望文明昌隆鼎盛是有志之士的期待，但文明極盛時恐怕隨即走向衰朽凋敝，此時勢之反轉亦為知識人應當注意的部分。此處呈現的是他對文明發展的熱切關懷，流露「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儒家精神。續看「艮」卦釋義：

艮，山相當而各止其所，內外不相與，六爻皆無應。上下靜止之時也。天地動而萬物生，日月動而晝夜成，聖賢動而天下亨。今止其者，君子理不可動之時也。故此卦無元亨貞之德者，以其道不行焉。然止之為道，必因時而存之。若夫時不可進，斯止矣；高不可亢，斯止矣；位不可侵，斯止矣。止得其時，何咎之有？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君子，其孰能與於此乎？²¹

「艮」卦為艮下艮上，「艮」的卦象為「山」，「山」有穩定靜止之象，連結到人事活動，恰好是「動」的反面——「靜」。前文所引「鼎」、「豐」兩卦釋義，表現的是范仲淹的政治思想和社會關懷，偏向「外王」層面，范仲淹的「艮」卦釋義則顯現他對君子道德

¹⁶〔宋〕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頁127。

¹⁷〔魏〕王弼；〔晉〕韓康伯，《周易王韓注》，頁172。

¹⁸〔魏〕王弼；〔晉〕韓康伯，《周易王韓注》，頁171。

¹⁹〔魏〕王弼；〔晉〕韓康伯，《周易王韓注》，頁172。

²⁰〔魏〕王弼；〔晉〕韓康伯，《周易王韓注》，頁172。

²¹〔宋〕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頁126。



隨義而發：從范仲淹詮釋《易》的方法看宋學典範的形塑

修養的體認，屬於「內聖」的學問。「鼎」、「豐」的卦義都傾向一種「動」的哲學，「鼎」卦言變革、創新，「豐」卦曰制禮、作樂，無不強調「人」作為道德主體所應展現的積極行動。不過，凡物有「動」則有「靜」，這亦是《易》揭示的宇宙運行之理。循此，范仲淹以「艮」卦指出賢者應該止於「理不可動」之時。

外在環境的種種條件限制，往往非個體所能掌握和改變，引文說：「夫時不可進，斯止矣；高不可亢，斯止矣；位不可侵，斯止矣。」儒者雖然有社會責任，但仍要審時度勢，當情勢不利自己推行理想時，應當明哲保身、安時處順。由「艮」卦釋義，可見范仲淹對儒者之定位，他雖然強調儒者應擔負起社會責任，但不以此作為衡量儒者價值的唯一指標，其實窮者亦可獨善天下，在當止之時停止作為，並非道德上的缺陷。從事政治事務的范仲淹，明瞭政治改革存在高風險性，事情的發展總有力有未逮之處，因此「艮」卦「當止則止」的處世哲學，可成為進退之際的考量依據。

從〈四德說〉、〈易義〉兩文的解經方法，可知范仲淹回到經典原文本身加以詮釋。《易傳》本是解《易》之論述，後人多以《易傳》作為解《易》之根據，范仲淹雖然也以《易傳》為基礎進行發揮，但他並不拘泥《易傳》的字句，而且從〈易義〉的行文，我們發現范仲淹習慣在文末以「故曰：『……』」的模式論證《易傳》之說。換言之，與其說范仲淹以《傳》來解經，不如說他以《傳》來證明其所釋之義的正確性，除此之外他並未刻意徵引其他前人注疏。由此可知，范仲淹擱置漢唐經學注疏的詮釋手法，而是藉由經典來闡釋自己的思想。

新的詮釋方法之所以被提出，往往在於固有方法已無法回應新時代的需求，然而假若學者對時代無深刻關懷，難以察覺社會之需求，也就缺乏形塑新詮釋典範的動機。因此〈四德說〉、〈易義〉不僅提供新的學術典範，細察其義理內涵，可知范仲淹從《易》尋找人生修養和政治實務的哲學基礎，其「易義」實涵蓋內聖外王兩個道德實踐的向度。儒者透過經典詮釋，提供道德實踐的理論基礎，而道德實踐則是「人」賦予自我存在基礎的路徑，因此這樣的經典詮釋行為，同時意味儒者對於「自我」的詮釋。在經典詮釋的過程中創造理想的自我圖像，正是一種「以經注我」的學術傾向。

綜上所述，范仲淹在〈四德說〉、〈易義〉實已顯露宋人解經的典範，張永雋指出范仲淹之解《易》：「全然以義理取勝，不主傳注，不宗訓詁，亦不重象數(……)他大膽認為聖人繫卦之辭可「隨義而發」，不凝滯於卦象，這種自由解放的解經方法，實開風氣之先，以後之胡瑗、石介皆著有《周易口義》，為義理說《易》之先河。」²²洵為確論。

(二) 融《易》入賦：主體和義理的結合

相較〈四德說〉、〈易義〉等文章，范仲淹特的賦作〈易兼三材賦〉、〈乾為金賦〉、〈窮神知化賦〉、〈天道益謙賦〉、〈蒙以養正賦〉、〈賢不家食賦〉、〈制器尚象賦〉、〈體仁足以長人賦〉、〈水火不相入而相資賦〉等篇，這幾篇與《易》有關的作品，或許更能彰顯范

²² 張永雋：〈范仲淹先生之哲學思想及其對宋代理學之影響〉，收於《范仲淹一千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1990年），頁258-259。



仲淹對《易》的認識。《易》本是哲學性濃厚的著作，因此將《易》作為認識活動中的客體，客觀地分析《易》所涵藏的哲學思想是很自然的詮釋進路，然而范仲淹卻將《易》融入文學創作之中，他不只是融《易》入賦而已，而是將《易》之義理作為賦作的核心主題。〈易兼三材賦〉等介於哲學和文學之間的特殊創作，本文認為足茲說明范仲淹使用經典的自由態度，哲學性的經典不一定非得用分析方法提煉其義，其實詮釋者可從其主觀意識進行各種詮釋型態上的轉換。

范仲淹留下的〈易兼三才賦〉、〈乾為金賦〉、〈窮神知化賦〉，恰好可區分作者對《易》三個義理層次的認識：〈易兼三才賦〉就《易》之整體闡釋其《易》之生發創作及實際功用；〈乾為金賦〉則是闡釋《易》中之卦象和卦辭；〈窮神知化賦〉則梳理《易·繫辭傳》之通變觀。以下依序說明，先見〈易兼三才賦〉中有言：

大哉！《易》以象設，象由意通。兼三材而窮理盡性，重六畫而原始要終。二氣分儀，著高卑於卦內，五行降秀，行動靜於爻中。所以明乾坤之化育，見天人之會同者也。昔者有聖人之生，建大易之旨。觀天之道，察地之紀，取卦於彼，將以盡變化云為之義，將以存潔淨精微之理。(……)若乃高處物先，取法乎天，所以顯不息之義，所以軫行健之權。(……)若卑而得位，下蟠於地，所以取沉潛之體，所以擬廣博之義。(……)於是卑高以陳，中列乎人。(……)《易》之為教也，達乎四維？觀其象則區以別矣，思其道則變而通之。上以統百王之業，下以斷萬物之疑。變動不居，適內化而無滯；廣大悉備，包上下而弗遺。至矣哉！

如果說〈四德說〉、〈易義〉是范仲淹對《易》部分義理的條列式分析，〈易兼三才賦〉就是范仲淹概括性陳述整部《易》的題旨。〈易兼三才賦〉有「通彼天、地、人謂之易」等八字的題解，此賦分別從天、地、人三個層面展開討論。范仲淹指出聖人觀察天、地、人的變化，再以卦爻的方式簡單表現宇宙變化之「理」。職此，三材本為《易》的根源，透過《易》可理解自然和人文世界的奧妙，《易》的偉大崇高之處，就在《易》揭示宇宙萬物的運行規律。然而，對范仲淹來說，儒者不應僅從《易》理解三材之特性，因為人具有道德的主體性，因此〈易兼三才賦〉提到人在掌握三材之性後，應該思考如何回饋宇宙自然，讓天、地、人以更接近理想的形態存在於宇宙。簡言之，〈易兼三才賦〉陳述的義理，從自然現象的「實然」面推進到更深層，屬於人文活動的「應然」面。〈易兼三才賦〉的敘述結構，表現范仲淹重視人文價值的創造，他不滿足於客觀知識的分析，所以設法進一步連結知識和人文的關係。

〈乾為金賦〉敘述「乾」卦的義理內涵，和〈四德說〉同為對「乾」卦的闡釋，因此可就二文互相參照，該賦有云：

大哉乾陽，秉乎至剛。統於天而不息，取諸金而可方。外著元亨，想有英而可睹；中含變化，知從革之靡常。(……)索隱而神道可極，取象而物形何遁？立夫乾也，所以體乎高明；為彼金焉，所以尚乎剛健。(……)金之性也，純剛在茲？察之則宛若，配之則宜其。(……)首萬化而道廣，方百煉而旨深。始終不離陰爻，寧虞



眾口；上下皆秉於剛德，若遇同心。美矣哉！《易》之取捨有如此者。仰運行之在上，荷生成之親下。故我后法乾元而居尊，致王度之如也。²³

〈四德說〉分析「乾」卦之「元」、「亨」、「利」、「貞」四卦辭象徵的意義，〈乾為金賦〉回到卦象本身，敘述「乾」卦所代表的剛健之意。「乾」為《易》六十四卦之首卦，代表「天」，亦是萬物之初始，見〈彖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²⁴此外「乾」卦有生生不息之意，是以和五行中之「金」相搭配，見〈說卦傳〉：「乾為天，為圓，為君，為父，為玉，為金」²⁵。雖然在《易》的經傳中，「乾」被賦予「初始」、「剛健」等特性，不過僅有〈說卦傳〉提到「乾為金」。范仲淹的〈乾為金賦〉進一步將本屬抽象概念的「乾」卦和具體物質的「金」作概念上的連結，藉由形下之「金」來表述「乾」卦代表的形上剛健特質。²⁶

〈乾為金賦〉從自然現象和人事行為兩大層面，反覆陳述「金」和「乾」的相同特質，如此再三迴還往復的行文模式，正欲強調「乾」所象徵之剛健概念，姜廣輝便指出范仲淹對《易》的詮釋體現一種「剛健有為，正直忠毅」的精神。²⁷正如前文所析〈四德說〉和〈易義〉的解易方式，范仲淹特別就「乾」卦作賦，說明他極重易學中積極動態的一面，這種選擇性的詮釋，本文認為與他憂慮天下的性格有關，正因為渴望對當代文教事業有所建樹，因此特別崇仰一股向上的力量。

范仲淹在《易》六十日卦中選擇「乾」卦作賦，於《易傳》則以〈繫辭傳〉為主題來作賦，申論其「窮神知化」的意義，如下引文：

惟神也感而遂通，惟化也變在其中。究明神而未昧，知至化而無窮。通幽洞微，極萬物盛衰之變；鈎深致遠，明二儀生育之功。大易格言，先聖微旨。神不知不識，化則無終無始。在乎窮之於此，得之於彼。苟精義而入焉，如至誠而感矣。（……）以斯設教，助人文而用之。是以聖人德合乾坤，道通晝夜，法至神而有要，臻大道而多暇。²⁸

〈窮神知化賦〉有題解：「窮彼神道，然後知化」。「窮神知化」出自〈繫辭傳〉：「窮神知化，德之盛也。」²⁹范仲淹繼承〈繫辭傳〉之觀點，陳述大自然如何展現「神」與「化」之現象，道德主體又當如何「窮」其「神」，「知」其「化」。范仲淹認為萬物之

²³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頁 433。

²⁴ 〔魏〕王弼；〔晉〕韓康伯，《周易王韓注》，頁 3。

²⁵ 〔魏〕王弼；〔晉〕韓康伯，《周易王韓注》，頁 238。

²⁶ 劉越峰指出范仲淹解《易》兼採象數和義理派的義例，〈乾為金賦〉正是代表，范仲淹雖然闡釋《易》中的儒家義理，但並未捨棄從卦象來解《易》，這是漢代象數易學的餘緒，而兼容兩種易學的特色也可以見范仲淹治學的包容態度。見劉越峰：〈范仲淹的解《易》特點及其對學術風氣的影響〉，《江西社會科學》12 期（2008 年），頁 64-67。

²⁷ 姜廣輝編：《中國經學思想史第三卷·上》，頁 107。

²⁸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頁 433。

²⁹ 〔魏〕王弼；〔晉〕韓康伯，《周易王韓注》，頁 223。



生滅興衰皆有最適切的安排布置，此現象之絕妙可謂之為「神」，是故儒者當細觀萬物，培養自身觀察力，方能體察萬物運行之理。誠然，〈窮神知化賦〉表現了范仲淹注重觀察變化之思想，不過此思想另有本體論前提，即宇宙萬物恆在變化中，因此儒者才需要善用觀察和體會，追尋適合自己發展之道途。當道德主體身在變動不居的環境，應有實際作為來面對必然之「變易」。正因為世界可以「變易」，所以人為的「革新」才可能落實。

承上所述，可推測范仲淹在「剛健」之態度和體認「變化」之意識的結合下，產生了以「改革」來創造新生命的思維。將〈易兼三材賦〉、〈乾為金賦〉、〈窮神知化賦〉的思想綜合觀之，可進一步理解范仲淹支持新政的思想資源為何。

〈易兼三材賦〉、〈乾為金賦〉、〈窮神知化賦〉在整個北宋易學中的特殊性在於范仲淹用「賦」的文體談論易學。「賦」和「說理」之用的散文，最大差別在於「賦」是一種善用「直陳其事」³⁰手法的文體。在〈四德說〉和〈易義〉等說理性散文中，明顯可見范仲淹敘述語脈的推理和論證過程，這是將知識當作客體研究的思維。反之，〈易兼三材賦〉等三賦並不存在明顯的論證過程，范仲淹使用大量的排比句和設問句，其排比句多有不見於說理性散文的冷僻字詞，設問句又不全如諸子學之語錄體，以問題帶出論述，三賦的設問往往只是作者個人慨歎式的發問。以上可見三賦雖以易學為主題，但在語言文字上仍有范仲淹的精心構作，不失為文學性的創作。此外，三賦中常見以「大哉」、「至矣哉」等形容詞讚嘆《易》之博大深奧，這表露范仲淹個人對《易》的崇仰。

由於「賦」此文類本身具有的文學性，因此融《易》入賦不僅反映作者使用經典的自由態度，若從文學創作的動機來看，作者和易學彼此的主客對立已消解，進入物我同一的境界，循此范仲淹得以自然而然地將《易》融入文學創作中，且以心悅誠服之態度歌頌易學的博大精深。「以經注我」已是一種融合自我和經典的詮釋進路，而范仲淹以儒家的哲學經典作為文學創作主題，本文認為是這一進路更極致的表現。

三、胡瑗及慶曆易學的形塑

（一）以我口解我經：胡瑗《周易口義》的詮釋方法

《易》在兩漢被定位為知識人必讀的「經典」後，《易》與經學的發展便存在不可分割的關係。經學在慶曆年間再度蓬勃發展，此一現象，皮錫瑞《經學歷史》在「唐宋變古時期」指出：「《困學紀聞》云：『自漢儒至於慶曆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據王應麟說，是經學自漢至宋

³⁰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開雕本，2011年），頁15。



隨義而發：從范仲淹詮釋《易》的方法看宋學典範的形塑

初未嘗大變，至慶曆始一大變也。」³¹皮氏引王應麟《困學紀聞》說法，推定漢宋學術的轉型時代始自慶曆。

皮錫瑞同時指出，劉敞（1019-1068）的《七經小傳》和王安石（1021-1086）的《三經新義》可作為代表漢宋學術典範轉折的指標著作。中國經學從漢學典範轉移為宋學典範，可謂是經學史的重大轉變。然而，慶曆時期其實並不算長，為時僅7年（1041-1048），因此這段不長的期間發生何事，足以讓流行數百年的漢唐學術型態發生根本改變？

宋代社會在慶曆時期發生的重大事件，首推范仲淹推動之慶曆新政。宋代儒學之所以能復興，范仲淹堪稱關鍵人物。³²慶曆新政雖然為時不長，卻持續深入地影響北宋學術的發展，范仲淹在新政中賦予太學獨立地位，拔擢胡瑗任州學教授，後來胡瑗一生幾乎都在官學教授五經，就《宋元學案》所載，影響學子眾多：「四方之士歸之，至庠序不能容，旁拓軍居以往之。」³³可見其盛況。胡瑗之易學更是廣受歡迎，程頤回憶胡瑗：「講《易》常有外來請聽者，多或至千數人」³⁴奠定胡瑗作為宋初三先生的地位（另兩人為孫復（992-1057）、石介（1005-1045））。

慶曆之際的儒者興起一股解《易》、疑《易》的風潮，范仲淹儘管未必是當時唯一的引領者，對當時的文化及學術卻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如前文所說，一個人的學術創新未必然形成「典範」，除非這個人的學術產生號召力，吸引同時代甚至後代人士跟進，形成採用相同方法治學的社群。范仲淹的治學方法影響宋初三先生，而三先生多被歷代學者視為宋學典範的源頭，如朱熹在《朱子語類》中曾說：「如二程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他們說經雖是甚有疏略處，觀其明治道，直是凜凜然可畏。」³⁵南宋末年大儒黃震（1213-1281）在其《黃氏日抄》中也說：

師道之廢，正學之不明久矣。宋興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徂徠石先生，始以其學教授，而安定之徒最盛，繼而伊洛之學興矣。故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語」。³⁶

以上可見三先生對宋代學術的開創意義，同時也意味著范仲淹對宋學的影響。三先生皆由范仲淹拔擢，才得以進入官學任教，發揮他們的學術影響。值得注意的是，范仲淹特別重用三先生等飽學之士，原因在於三先生的理念、學養、教學方法符合范仲淹的要求，因此才能獲得他的信任。換言之，范仲淹和三先生在思想觀念和治學方法上必然有相當的共通處，才能彼此呼應，形成學術社群。范仲淹在中央擘劃新政，三先生在地方落實新政，中央地方妥善搭配，進而改變慶曆之際的學術風氣。范仲淹和三先生的思想傳承，

³¹ 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220。

³² 參見蔡方鹿：《中國經學與宋明理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101。

³³ 〔明〕黃宗羲：《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25。

³⁴ 〔宋〕程頤：《伊川文集卷三·回禮部取問狀》，收於朱熹編：《二程全書》（台北：中華書局，1966年），頁6。

³⁵ 〔宋〕朱熹：《朱子語類·春秋經》卷83（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2174。

³⁶ 〔宋〕黃震：《黃氏日抄》卷45，收於《黃震全集》第五冊（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533-1534。



從易學可以看得相當分明，下文分析胡瑗詮釋《易》的方法。³⁷

胡瑗，泰州人。根據《宋元學案》所載，自小聰穎能文，十三歲即通五經，因家貧，故往泰山苦學十年，期間未曾返家。後來獲范仲淹聘為蘇州州學教授，史載其教學設計：

科條纖細具備。立「經義」、「治事」二齋：經義則選擇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始之講明六經。治事則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講武以禦其寇，堰水以利田，算曆以明數是也。³⁸

由此可知胡瑗講授「經義」並不是為了「袖手空談心性」，他也重視實務之學，在「經義」之外設立「治事」，培養未來可以從事政治實務的人才。胡瑗的教學設計兼顧內聖、外王二層面，讓儒家義理可和政治實務相輔相成，這與范仲淹理想中的「明體達用」之學合拍。因此，楊新勳認為胡瑗：「在教學中宣揚新的學術思想。胡瑗的思想重倫理價值和經世致用，以之消釋漢代陰陽五行、天人感應的目的論神學，有用人文理想和政治理性翻新《周易》、《春秋》、《尚書》內涵的用意。」³⁹ 若不是胡瑗在地方上以實際行動來落實范仲淹的理念，或許慶曆新政和易學就不會有歷史上的成果。

蔡方鹿指出胡瑗的經學著作「體現了以義理解經的原則，而與漢學學風不同」⁴⁰緣此，胡瑗如何以義理解經，賦予經典新的意義？胡瑗的著作有《周易口義》、《春秋口義》、《洪範口義》、《中庸義》，以「口義」為名，可推測胡瑗當時僅為口授經義，再由弟子著錄成書。其中《周易口義》不僅是胡瑗解《易》，也是他解經的代表作，他透過解《易》闡釋儒家思想⁴¹，由於弟子眾多，方能讓宋代義理易學開出新局，形成慶曆易學。下文便以《周易口義》中「鼎」、「豐」、「艮」三卦之釋義為例，說明胡瑗的解《易》方法及其易學思想，藉此跟前文所論之范仲淹〈易義〉對比，彰顯慶曆易學特色：

「鼎：元亨吉。」(……)鼎者，變生為熟，革故取新之謂也。言聖賢之人，凡欲革天下之弊亂，必須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禮樂，以新天下之視聽。故必法制齊明，德其盡善盡美，然後獲元大之吉，其道是以亨通也。⁴²

「鼎」卦代表革新，胡瑗以「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禮樂」說明政治改革的基本工作。胡瑗也肯定有些人之所以可以稱聖賢，在於不畏艱難革除弊端，並以「法制齊明」、「盡善盡美」作為最終目標，可謂「止於至善」的境地。改革之後才得以運勢亨通，進入大吉之境。胡瑗對「鼎」卦的釋義，大抵跟范仲淹相同，顯現對於改革的盼望和肯定。

³⁷ 吳茂松從胡瑗的易學指出其人深得儒學精粹，其思想特徵講求天人相應和重視外王事功。他認為胡瑗的易學雖受王弼與孔穎達等人影響，但胡氏敢於修正《周易》經傳，批判王、孔注疏。然而該文對與胡瑗同時代的范仲淹卻未及著墨，事實上胡瑗的治學方法乃是受范仲淹影響，見吳茂松：《胡瑗易學哲學研究》（宜蘭：佛光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³⁸ [明]黃宗羲：《宋元學案》，頁24。

³⁹ 楊新勳：《宋代疑經研究》，頁56-57。

⁴⁰ 蔡方鹿：《中國經學與宋明理學研究》，頁103。

⁴¹ 參見漆俠：《宋學的發展和演變》（北京：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213-230。

⁴² [宋]胡瑗：《周易口義》二冊八卷（台北：商務印書館，1972年），頁42。



再看「豐」卦之釋義，可以更清楚看到胡瑗以口解《易》的特色：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凡得其所歸者，其道必盛大，故以豐次於歸妹。然則豐者，王者，富有天下，生聚繁夥，民物眾多，是天下眾大之時也，故謂之豐。繼富有天下，以至豐盛之極，是其道大通矣。

王假之者，凡有聖人之德，有仁義之道，苟不得其時，不得其位，則無興天下之勢，無居天下之資，是則雖有仁義之道，安能有所為哉！故聖人必假此豐盛之時，發號施令，則民易以從行賞用罰，則民易以服，以至制禮作樂，施發教化，可以大行於天下也。勿憂，宜日中者，夫天下至廣，有教化之所不能及者，有一物不得其所者，是王者之所憂也，今戒之。勿憂者，日中則宜也，蓋言日未中之時，則其明未盛，日之過中，則其明將衰惟。是日中正之時則遍照天下，無纖悉幽隱，不被其光輝，聖人雖富有天下，必須仁義道德遍及於天下，使無一民一物不被其澤，不被其燭，如此可以勿憂恤也。⁴³

引文強調聖王必須把握運勢，在有權有勢之時積極「制禮作樂，施發教化」，讓天下萬民皆有機會接受禮樂教化，此卦釋義無非是強調上位者身負教化庶民的責任。范仲淹對「宜日中」的解釋，顯現他擔憂文明之盛極而衰，因此掌管教育文化的上位者應該注意時勢之變化。胡瑗則以為聖王之德猶如天上之日，日中之時反而可以普照天下、廣施恩澤，如此無需憂慮仁義道德之不行，顯見其對聖王之德及教化之功相當有信心。胡瑗也更在意時勢對懷抱理想之人的重要性，所以才會說：「得其時，不得其位(……)是則雖有仁義之道，安能有所為哉！」總言之，胡瑗對「豐」卦的釋義較范仲淹更強調聖王在禮樂教化上的責任，再看「艮」卦之釋義：

「艮：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艮者，止也。蓋言人之動靜，各有其時，若動而不已，必有悔吝生，故以艮次於震，所以為世動靜之戒也。

夫艮者，山之象，山為地之鎮，安止而不動，故為止之象。背者，目所不見之所也，言艮止之道，必止於未萌之前，若夫聖人之治天下，將禁民之邪，制民之欲，節民之情，止民之事，必於其利害未作，嗜欲未形，未為外物之所遷，而其心未動之前，先正其心而不陷於邪惡，若止之於背之後，目所不覩而不見其身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夫庭者，指淺近之處而言之也，行於淺近而猶不見其人者，蓋止得其道，各守其所，而有定分不相操雜故也。古之聖人之治天下也，其在建官分職，各有所責，若習禮者，專長於禮，習樂者，專掌於樂(……)各守其職，而不相干也。

又如天下之民，為士者止於為士，為農者止於為農(……)是亦各有定分，不相操雜處，不易業而守其常，故如行於淺近，一庭之間而不見其人。是其各有所止，

⁴³ [宋]胡瑗：《周易口義》二冊九卷，頁 31-32。



而不相雜亂也，無咎者言，能止其事於未萌之前，使官民各得其止，不相操亂，故無咎也。⁴⁴

范仲淹「艮」卦釋義偏向個人修養，君子應觀察時勢，在適當時間韜光養晦，以靜待變，則是范仲淹「當止則止」之意。胡瑗解釋「艮」卦卻「當止則止」連結外王事功，「止」成為聖人治民之法，這是范胡不同之處。胡瑗認為聖人應該使人民「正心制欲」，讓「欲」止於未發之時。更特別的是胡瑗將「止」擴大解釋為職分，每個人在社會中都有他應該扮演的角色，因此貫徹「艮」卦精神的社會，人人將固守其本分，不會逾越分際，士農工商各司其職，百官各安其位，社會便可維持秩序。過去解者從個人修養來看「艮」的義理，胡瑗卻使之與禮樂教化連結，原本以「靜」為主要概念的「艮」卦，在胡瑗眼中竟變得充滿積極意義。而從「艮」釋義的文字風格來看，胡瑗頗為細膩地說明卦辭代表的意義，大抵可窺見以口語解經的痕跡。

綜上所述，胡瑗的《周易口義》較范仲淹更重視聖人教化的面向，尤其「艮」卦大談「正民心」、「制民欲」、「節民情」、「禁民邪」，強調要在「心未動」時「去其邪」，可見他認為人性本來聖潔純善，是外在情欲的滋擾才讓人性變質，胡瑗思想中的孟學色彩可謂相當濃厚。然而，胡瑗解《易》雖和范仲淹略有出入，但這正說明慶曆易學的詮釋方法乃是各憑己意，所以言人人殊是自然正常的現象。而慶曆易學所展現的詮釋方法，並非侷限於《易》而已，范仲淹和胡瑗在閱讀其他經典時，也以相似的方法詮釋經典。

（二）舍傳求經：孫復、石介等人的經典詮釋方法

胡瑗長期在官學任教，口述大量的經學講義，培養大批學生，較知名的如孫覺、范純佑、范純仁、程顥、程頤、徐積、呂希純、錢藻等，楊新勳指出這些學生：「大都在不同程度上繼承了胡瑗的經學思想和治學路數。可以說胡瑗對轉變宋代學風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⁴⁵因此，北宋經學掀起「疑經」、「議經」風潮，胡瑗扮演之先行角色頗為重要。

胡瑗的易學對後代宋學影響深遠，同期的孫復、石介都有易學著作，因而形成所謂的慶曆易學。易學之外，孫復、石介的春秋學亦頗受時人重視。孫復著有《春秋尊王發微》、《易說》、《睢陽子集》，其中《春秋尊王發微》對當時影響頗深。孫復在其春秋學中提倡尊王，號召以仁義禮樂為學，期望建立儒家道統。浦衛忠指出孫復相信透過闡釋《春秋尊王發微》，可獲得聖人之旨，既然《春秋》據傳是孔子所整理編輯之史籍，應是最能反映孔子思想的經典，因此孫復以《論語》解《春秋》，使兩書彼此互證其義；遇到經義上難以疏通處，孫復亦不惜判定為脫漏、訛誤等⁴⁶。

范仲淹便讚賞孫復：「公以孫明復居泰山之陽，著《春秋尊王發微》，得經之本意為

⁴⁴ [宋]胡瑗：《周易口義》二冊九卷，頁 8-10。

⁴⁵ 楊新勳：《宋代疑經研究》，頁 57。

⁴⁶ 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第三卷·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3 年），頁 165-180。



隨義而發：從范仲淹詮釋《易》的方法看宋學典範的形塑

多，學者皆以弟子事之。公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國子監直講。」⁴⁷范仲淹以孫復可得經之本意，推薦他擔任國子監直講。然而，既然不讓自己被前代的經典注疏所限制，孫復對《春秋》的解讀是不是真的獲其本意，范仲淹個人的主觀感受可能才是其判斷根據，由此可知范仲淹認同孫復的經典詮釋方法。

石介著有《易解》、《易口義》、《唐鑒》、《三朝聖政錄》，可見曾與胡瑗一樣以口語來詮釋《易》，不過經學相關著作亡佚殆盡，僅存少數殘篇，完整流傳下來的著作有自編文集《徂徠集》二十卷。現在從他若干文章中，仍可看出其經學觀，如〈錄蠹書魚辭〉有云：

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易》，其九師之蠹乎？《春秋》，其三傳之蠹乎？《詩》，其齊、韓、毛、鄭之蠹乎？《禮》其大戴小、戴之蠹乎？
48

這是石介對漢唐注疏的強烈批判。文中子王通（580-617）以為漢代師法形成後，「經」之「傳」反成經學主體，使得最原始的經典漸趨沒落。石介反對此一觀點，他認為「經」是經學主體，其文化意義遠大於「傳」。由此可知，石介認為後人解經未必非得通過傳、注、疏的解釋不可，而是可憑其己意，自行進入經典的世界，對經典賦予自己的詮釋。〈上孔中丞書〉也表達相同的經典觀：

左氏、公羊氏、穀梁氏、或親孔子，或去孔子未遠，亦不能盡得聖人之意，至漢大儒董仲舒、劉向，晉杜預，唐孔穎達，雖探討甚勤，終亦不能至《春秋》之蘊。
49

石介認為即便是時間比較接近孔子的春秋三傳，都不能確定是否能彰顯聖人旨意了，既然如此，後人理解經典當不必依賴五經之傳、注、疏，石介的經學傾向可謂「舍傳求經」。此外，石介還有多篇討論前人注疏錯誤的文章，馮曉庭認為石介的經學：「正是其後宋儒研究經學的基本態度，宋代學者能夠「以己意解經」的方式，繼漢代學者之後開創經學發展史的另一高峰，就是因為他們對歷史經驗的認識更加深刻與進步的人文風氣使然。」⁵⁰從范仲淹和胡瑗詮釋《易》方法，可知他們將閱讀經典的「自我」作為詮釋經典的主體，經典與「自我」之間彼此互相賦予意義，既開創宋代學術典範，也為宋代義理易學奠定基礎。

四、餘論

⁴⁷ [宋] 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頁 816。

⁴⁸ [宋] 石介：〈錄蠹書魚辭〉，收於《徂徠石先生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81。

⁴⁹ [宋] 石介：〈與張洞進士書〉《徂徠石先生文集》，頁 164。

⁵⁰ 馮曉庭：《宋初經學發展述論》，頁 195。



范仲淹自北宋天聖年間（1023-1032）已開始上書朝廷，如在〈奏上實務書〉中力諫「救文弊」⁵¹，在〈上執政書〉中力諫「舉縣令，擇郡守，以救民弊」⁵²，這些上書中，可見范仲淹秉持「窮則變，變則通」原則作為改革的思想基礎⁵³。這些著作再三強調六經教育的重要，所以恢復某種理想中的經學典範顯得更加迫切，問題在於經學既然從未斷絕，科舉考試的題目也來自經書，經學未能發揮他應有的政教功能，顯然另有原因限制了經學的發展。范仲淹認為是唐代明經科考試對經學帶來莫大損害，因此在慶曆三年（1043），他上書著名的〈答手詔條陳十事〉，列舉十件重要的政治改革方案，其中跟教育有關的部分，成為後來慶曆新政中教育和科考改革的內容⁵⁴。他特別提到「墨義」的不良影響，「墨義」猶如現今的默書，測驗考生能否將五經注疏一字不漏地默寫出來。由此可知，唐代的科舉考試制度，導致讀書人不是專注於作詩寫賦，便是將青春用於記誦五經注疏。考試制度造成經學和社會脫節，范仲淹遂憂心「有才有識者十無一二」，國家將陷入毫無人才的險境，改革現況的方法就是徹底改變原有的考試方法。

范仲淹提出「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的主張，他並未完全廢除固有的考試方法，可見范仲淹肯定士大夫應有一定的美學素養和章句訓詁的能力，但更重要的是他在固有的考試方法前，加上「策論」和「通經旨」。「策論」反映「達用」的思想，士人必須要能針對時弊提出看法，剖析問題的根源並提供解決的方案；「通經旨」則反映「明體」的思想，士人不僅要熟悉經書文字表面的意思，更要能掌握背後的涵義，將經書作為學習的對象，了解聖人著作經書的用意，古人如何將經書中的知識與智慧應用於政治和日常生活。簡言之，范仲淹的考試方法體現他將經學作為一種「明體達用」的學問。

范仲淹不僅改革取士制度，更將收納寒微子弟的太學從供給貴族子弟就學的國子學中獨立出來，擴大太學的功能和資源，並在地方廣設學校，致力於普及教育，帶動講學議論的風氣。⁵⁵然而，慶曆新政就現實面來看並不算成功，實行一年就告終，但是以范

⁵¹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頁 172-179。

⁵²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頁 184。

⁵³ 天聖八年（1031）的〈上時相議制舉書〉：「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機，陳得失之鑑，析是非之辯，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見〔宋〕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頁 201。以六經為首的教育可以激發一個人包括感性和知性層面的心智能力。國家治理的關鍵在於培育人才，人才是國家的根本，而學習的內容當以儒家經典為核心。

⁵⁴ 〈答手詔條陳十事〉：「卿大夫之職既廢久矣，今諸道學校如得明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者十無一二，況天下危困之乏人如此，將如何救？〔……〕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務在興行，其取士之科，即依賈昌潮等起請，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道，則天下講學必興，浮薄知勸最為至要。」見〔宋〕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頁 478。

⁵⁵ 太學和國子學的分別相當複雜，粗略而言，出身寒微的子弟鄉試及第者可入太學學習，世襲的氏族貴族子弟則在國子學就學。國子學教授的治學方法較為保守，大抵沿襲唐代五經的注疏模式，因此太學的自由講學風氣相對較盛，參見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4年），頁 59-91。



仲淹在學林的地位，新政帶給社會的影響卻很大。⁵⁶

將范仲淹的政治改革與治學方法合而觀之，我們可以更具體了解一個人的思維如何影響他的作為，學術與政治兩者之間如何彼此成就。儘管范仲淹解《易》的文章為數不多，但已充分展示有別於漢唐注疏的新詮釋思維和方法。他從《易》擷取可供人倫日用和國家政治的思想資源，但不拘泥於前人注疏，而是採用隨義而發的方式，憑胸臆所思，以己意來解經，因此他的理想和性格便反映在《易》義理的詮釋當中，展現一種「以經注我」的傾向。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范仲淹創作數篇以《易》為主題的賦，這類介於文學和思想之間的作品，傳達范仲淹對於經典詮釋的自由態度。他對《易》的深刻體會，足以使他將自己和義理融為一體，並以虔誠之姿頌讚《易》的宏偉壯美。而深受范仲淹影響的胡瑗，也採用隨義而發的方式來解《易》。胡瑗解《易》相較於范仲淹，更著重於聖人的道德教化，反映主體對於存天理、去人欲的期盼，實已展露理學的先聲。綜上所述，皆反映一種將《易》與現實生命結合的詮釋觀點，使原本僅剩考試用途的經書重新獲得生命力。本文認為，或許就思想嚴謹度和完整性來說，范胡二人的易學無法與之後的程朱等人比較，但若沒有前行者的示範與啟迪，後進者未必可順利邁開大步。緣此，范胡二人的易學貢獻雖然主要是詮釋方法的革新，而非理論和概念的建構，但仍然具有轉折關鍵的重要意義，應在學術史上有其位置。

⁵⁶ 李弘祺更指出慶曆新政當中的科舉改革方案，招致缺乏公平性的批評，且新政失敗後，太學重被歸入國子學內，財產充公，經費被大幅刪減，慶曆之後的幾年，幾乎是太學最艱困的時期。參見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頁 59-91



徵引文獻

一、傳統文獻

-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開雕本，2011年）。
- 〔魏〕王弼注；〔晉〕韓康伯：《周易王韓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
-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
- 〔宋〕胡瑗：《周易口義》（臺北：商務印書館，1972年）。
- 〔宋〕石介：《徂徠石先生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宋〕程頤：《伊川文集》，收於朱熹編：《二程全書》（臺北：中華書局，1966年）。
- 〔宋〕朱熹：《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宋〕黃震：《黃震全集》第五冊（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
- 〔明〕黃宗羲：《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 方健：《范仲淹評傳》（南京：南京大學，2001年）。
- 王鐵：《宋代易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臺北：藍燈文化事業，1991年）。
- 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4年）。
- 姜廣輝編：《中國經學思想史第三卷·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
- 郭紹虞：《中國歷代文學論著精選》（臺北：華正書局，1991年）。
- 馮曉庭：《宋初經學發展述論》（臺北：萬卷樓，2001年）。
- 楊新勳：《宋代疑經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楊儒賓：《從《五經》到《新五經》》（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年）。
- 漆俠：《宋學的發展和演變》（北京：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
- 蔡方鹿：《中國經學與宋明理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二）專書論文或期刊論文

- 朱漢民：〈范仲淹易學的宋學精神——從玄學易理到宋學易理的轉型〉，《哲學與文化》44卷3期（2017年），頁81-93。
- 李瀋陽：〈范仲淹《易義》對《周易》的詮釋方法〉，《濱州學院學報》25卷2期（2009年）。



年)，頁 23-25。

張永雋：〈范仲淹先生之哲學思想及其對宋代理學之影響〉，收於《范仲淹一千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1990年，頁 258-259。

楊亞利：〈「慶曆易學」發微〉，《周易研究》4期（2004年），頁 71-80。

劉越峰：〈范仲淹的解《易》特點及其對學術風氣的影響〉，《江西社會科學》12期（2008年），頁 64-67。

蔣偉勝：〈范仲淹哲學的架構及其宋代新儒學的意義〉，《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新探索》（2013年），頁 414-425。

（三）學位論文

吳茂松：《胡瑗易學哲學研究》（宜蘭：佛光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程 成：《論范仲淹對北宋儒學復興的貢獻》（天津：南開大學中國哲學碩士論文，2008年）。



Following the Righteousness: From Fan Zhongyan's Study on the Book of Changes to See the paradigm of Song Learning

Chuang, Yu-tuan

Abstract

Cheng Yi (程頤) is often regarded as the first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Yiliyi Studies in the Song Dynasty. Zhu Xi (朱熹) was inspired by him to create the peak of Yiliyi Studies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 of the Song Dynasty is to "interpret the scriptures with one's own will." It does not stick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biography, annotation, and sparse, but directly interprets the classics, which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way of exegesis in the Han Dynasty. Cheng Yi's Yi-learning Hu Yuan (胡瑗) had a deep influence. Tracing back to Hu Yuan's pedigree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background, it can be seen that Hu Yuan's academic style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Fan Zhongyan (范仲淹), who can be regarded as a pioneer who created an academic model in the Song Dynasty. This article will re-examine the methods used by Fan Zhongyan and Hu Yuan to interpret the "Yi", reconstruct Fan Zhongyan's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approach through text analysis, point out the Songxue paradigm shown therein, and then clarify the role of Fan Zhongyan and Hu Yuan in the process of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and shaping in the Song Dynasty. status.

Keyword : Fan Zhongyan 、 Hu Yuan 、 "Yi" 、 paradigm 、 Song Learning